

# 法国重农学派视野里的中国形象<sup>\*</sup>

耿兆锐

**内容提要:**17至18世纪,欧洲兴起了长达百年的“中国热”。随之,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思想对法国重农学派的学说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作为西方经济学家中最先关注中国的群体——法国重农学派——对中国的兴趣点也主要是集中于经济方面。本文以重农学派代表人物魁奈为中心,探讨他们眼里的中国古代政治经济形象,并分析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从而更好地为目前中西方经济文化交流提供历史借鉴。

**关键词:**法国重农学派 魁奈 中国古代经济思想

重农学派<sup>①</sup>兴起于18世纪50至70年代,随着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爆发而渐趋瓦解。它是一批以魁奈为首的法国经济理论家和改革家,他们阐述了一种取代重商主义(Mercantilism)的学说,因而被称为重农学派或重农主义。“重农主义者”一词虽然是魁奈发明的,但直到19世纪它才成为常用的术语。在18世纪,魁奈的学生和信徒喜欢别人称他们为“经济学家”。重农学派的成员还有杜尔哥、米拉波侯爵、古尔奈等。<sup>②</sup>重农学派产生的背景是:政治上,法国大革命前夜,社会政治经济矛盾不断激化;经济上,重商主义政策使法国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思想上,法国启蒙思想家为重农学派提供了哲学基础;国际上,同时期欧洲的“中国热”<sup>③</sup>对其产生了重大影响。

由于重农学派把魁奈作为其理论宗师和公认领袖,该派其他成员大多是吸收和接受魁奈的观点并加以阐释与传播。因此,本文分析重农学派视野里的中国形象,主要是围绕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思想对魁奈重农经济学说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其它方面本文暂不涉及。

## 一、“中国热”与重农学派

17—18世纪的欧洲,正处于资本主义大工业到来的前夜,社会经济生活的巨变带来了政治思想文化上的变革。转型时代,西方思想家们把对宗教愚昧的抗拒、对君权神授的怀疑与当时仍居世界前列、繁荣富强的中华帝国结合起来,他们通过对东方异域文化的比较、认同来达到重铸法国本土文

[作者简介] 耿兆锐,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讲师,宁波,315211,邮箱:cydxft@126.com。

\* 本文是浙江省教育厅科研资助项目(项目编号:Y201327425)的成果。

① 法语“重农学派”(Physiocratie)一词来自希腊文,由两部分组成,Physio表示“自然”,cratie表示“力量、权力”。后来英国古典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依据魁奈理论的核心思想,即重视农业,这与重视商业的重商主义学派相对,因而将其称为“农业体系”(Agriculture System),后来汉译为“重农学派”。其实,这个中文译法并不准确,容易让人望文生义,对该学派的学说产生片面认识。

② 魁奈(Francois Quesnay,1694-1774),法国皇家御医、经济学家,重农学派的创始人,代表作《经济表》、《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杜尔哥(Anne Turgot,1727-1781),法国政治家、重农学派的追随者。担任财政总监时,大力实践重农主义学说为指导的雄心勃勃的经济改革计划。米拉波(Victor Mirabeau,1715-1789),法国重农主义者、学者。代表作《税收理论》、《经济学》、《人类之友》。古尔奈(Jacques Gournay,1712-1759),法国重农主义者、商人、政府官员,有学者认为是他发明了经济学“自由放任”(laissez-faire)一词,代表作《东印度公司实录》、《对商业的思考》。详情可参见[美]彼得·赖尔·艾伦·威尔逊著,刘北成、王皖强编译:《启蒙运动百科全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96—298页。

③ 有关西方“中国热”,详情参见许明龙:《欧洲18世纪中国热》,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化的目的。因此,波及整个欧洲的“中国热”就是这一背景的产物。

“中国热”在法国的广度和深度都远远超过其他欧洲国家,中国的影响在法国最大、也最持久。<sup>①</sup>众所周知,18世纪被称为法国的时代。其实,在某种意义上,它又何尝不是一个“中国世纪”。因为在当时的法国,“中国比欧洲本身的某些地区还要知名”。当时有人在英国《世界杂志》上载文慨叹:“现在的风气,一切都变为中国式或中国化了。甚至最平常的用具,无一不受中国的影响”。<sup>②</sup>一句话,启蒙时代欧洲的中国观被涂上了一层靓丽迷人的玫瑰色。<sup>③</sup>

重农学派出现的年代,中国文化对于欧洲人已不再陌生,甚至有的中国元素成功融入欧洲本土文化体系中。法国人从中国文化中获得的启示,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推崇理性的发展,另一方面遵守自然的法则。前者的代表是伏尔泰,后者的代表是魁奈。<sup>④</sup>重农学派领袖魁奈本人因治疗皇太子疾病而擢升为国王路易十五的御医,进入巴黎使他有幸亲身感受当时的“中国热”。而贵族的身份又使他有幸与法国当时崇尚中国的知识精英——启蒙学者——密切来往。所有这一切都激发了魁奈和他的重农学派关注中国经济思想、研究中国政治制度的兴趣。

除了欧洲大环境的“中国热”氛围之外,重农学派获得中国信息的主要途径有三:一是,欧洲来华传教士们的译作和著述。如法国耶稣会士杜赫德<sup>⑤</sup>编辑的《耶稣会士书简集》、《中华帝国全志》影响最大。<sup>⑥</sup>二是,欧洲访华使节或商人的见闻录。三是,与中国人直接交往。这方面最知名的案例是重农学派的另一代表人物、曾任法国财政大臣的杜尔哥。赴法留学的中国基督教徒高类思和杨德望,<sup>⑦</sup>于1673年在巴黎候船返国,杜尔哥获悉后,向他们询问了有关中国工农业、科技等方面的情况,彼此过从甚密,以致于这两个中国人有“杜尔哥的中国人”之称。<sup>⑧</sup>这两位中国人回国时,杜尔哥写了《给两位中国人关于研究中国问题的指示》,列出了52个问题的调查提纲,内容涉及中国的经济生活和经济制度的方方面面,并委托高、杨二人收集中国工艺和科学技术,还专门撰写《关于财富形成和分配的考察》这部名著,以备高类思和杨德望两人系统了解重农学派的理论与学说!<sup>⑨</sup>所有这些都显示出杜尔哥和重农学派对于中国的重视!他的一系列思想观点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尤其是对亚当·斯密学说的发展有着极其重大的影响作用。

作为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前奏,重农学派融政治目标、经济思想、哲学思想于一体,他们从自然法则出发推崇中国,其思想主张与中国传统观点联系密切。重农学派对中国的关注点集中于经济和社会生活方面,因此他们眼里的中国形象具有鲜明的实证化和实用化的倾向。应当说,重农学派,无论是其代表人物的文化背景,还是思想体系本身,特别是自然秩序学说、重农理论等思想等都大量汲取了中国传统重农思想中的积极因素。<sup>⑩</sup>

① 许明龙:《欧洲18世纪中国热》,第119—143页。

② 谈敏:《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9页。

③ 17—18世纪间,西方社会文化生活中普遍出现一种泛中国崇拜的思潮,人称“中国潮”(Chinoiserie)。它既指一般意义上西方人对中国事物的热情,又指艺术生活中对所谓的“中国风格”的追慕与模仿。

④ 阎宗临:《中西交通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8页。

⑤ 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 1674—1743),法国神父、著名汉学家、整理耶稣会士信函的负责人。1735年出版《中华帝国全志》,该书全名是《中华帝国及其所属鞑靼地区的地理、历史、编年纪、政治及博物》,在1738年被翻译为英文。

⑥ 18世纪欧洲关于中国的“三大名著”:《中华帝国全志》、《耶稣会士书简集》、《北京耶稣会士中国纪要》这三部名作的刊印,在法国乃至欧洲引起轰动,迅速成为欧洲了解中国的主要参考书。

⑦ 有关这两位留法中国基督徒的情况,详情可参见,许明龙:《欧洲18世纪中国热》,第35—37页。

⑧ 许明龙:《中国古代文化对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影响》,《世界历史》1983年第1期,第28—29页。

⑨ [美]阿瑟·门罗著,蔡受百译:《早期经济思想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299页。也可参见,折剑飞:《世界的中国观》,上海:学林出版社1991年版,第226页。

⑩ 关于法国重农学派的思想渊源,学术界对此有两种争论:一种认为深受古希腊重农思想的影响,另一种则认为受到了中国古代重农思想的辐射。笔者赞同后者。重农学派的代表人物魁奈十分倾慕中国文化,尤其赞赏孔子学说,被誉为“欧洲的孔子”,足见其受中国文化影响之深。详情可参见,韦苇、周少琰:《重农学派与中国古代重农思想异同述评及启示》,《经济思想史评论》2007年第1期。

## 二、道法自然与自然秩序

中国传统文化中,老子为我们提供了最高层级的方法论——“道法自然”。所谓“道”,是指规律、法则之意,是宇宙万物发展变化的总规律。所谓“自然”,就是宇宙之本源。南宋的朱子理学因为倡导这种中国式的自然法则思想,使得它在启蒙运动时期的欧洲备受尊崇。

自然秩序思想是法国重农学派经济思想的哲学基础。所谓“自然秩序”,是指人类社会中存在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重农学派认为,世间存在一种基于自然法的自然秩序,这种普遍而永恒的法则超越了人类活动领域,反映出构成宇宙的终理性。明智的统治者和管理者会努力揭示这一法则,然后按照这一法则的基本原理和规定来安排各自的社会。<sup>①</sup> 魁奈举例说,“为了认识时间和空间的规律性,控制航海,保证贸易,必须正确地观察和计算天体运动的规律。同样地,为了认识结合成社会的人的自然权利的范围,必须尽可能以作为最好统治基础的自然法则为依据。这个人们必须服从的统治,对于结合成社会的人来说,是最有利的自然秩序,同时也是实定法的秩序”。<sup>②</sup>

魁奈试图找出中华帝国古老而繁荣不息的终极原因和规律。在其《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sup>③</sup>一书中,魁奈认为,所有的国家都忽视了按自然法则来建立自己的国家,只有中国是例外。因为在他看来,中国以天为最高立法者,以合乎人性的道德准则为法,因此,中国的法律就是自然法。难怪他说:“中华帝国的政治制度和道德制度是建立在对于自然法认识的基础上,而这种制度也就是认识自然法则的结果”。<sup>④</sup> 魁奈还补充说:“中国政府的基本法是建立在如此无可非议的和如此受到重视的自然法的基础之上;自然法的存在使君主不敢违法作恶,能够保证他合法地行使职权,保证最高权力人物积德行善”。<sup>⑤</sup> 魁奈呼吁,任何国家若以中国为榜样,尊重“自然秩序”,上帝就会赐给他驱散黑暗的火炬,在荆棘载途的迷宫中平安前进。<sup>⑥</sup> 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魁奈没有看到深藏在中国封建政治制度和道德制度里面的那些消极因素。他所赞颂的中华帝国并没有保持长久的繁荣,以后的历史很快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重农学派还从自然秩序引伸出经济自由主义,提出“自由放任”的著名口号。这颇似古代中国从“顺天之道”或“取法于天”的观念出发,主张“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信奉“无为而无不为”的从政原则。<sup>⑦</sup> 重农学派的自然秩序思想受到孔子学说的影响,承认道德的规律和秩序;认为人类社会和物质世界一样,存在着永恒不变的自然秩序;反对政府干预,政府主要是遵守自然秩序的法则。<sup>⑧</sup>

启蒙时代的欧洲,凡是主张开明专制的思想家,无不以中国作为他们构建理论的事实依据。由于魁奈的自然法概念非常类似于儒家的“道”,即尊重自然秩序,皇帝虽有权利,却必须守此自然法,所以魁奈称中国政治为“合法的专制”。重农学派反对革命和起义,他们寄希望于开明统治者施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也就是所谓开明君主专制。就像他极为推崇的中国的三皇五帝那样统治百姓。魁奈说:“中国早期的几位帝王都是很好的统治者,他们所制定的法规和所从事的主要活动都无可厚非。人们认为他们通过颁布公平的法规,倡导有用的技艺,专心致力于使他们统治的王国繁荣。尧一生

① [美]彼得·赖尔、艾伦·威尔逊著,刘北成、王皖强编译:《启蒙运动百科全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96页。

② [法]魁奈著,吴斐丹、张草纫译:《魁奈经济著作选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04页。

③ 魁奈于1767年发表的《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一书出版后,曾被看作当时法国经济学家“崇尚中国运动的顶峰之作”,并在18世纪下半叶处于西传的中国文化风靡欧洲的潮流中起了推进作用。

④ [法]魁奈著,谈敏译:《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37页。

⑤ 魁奈著:《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中译本),第82页。

⑥ 《魁奈经济著作选集》(中译本),第395—420页。

⑦ 谈敏:《重农学派经济学说的中国渊源》,《经济研究》1990年第6期,第71页。

⑧ 韦苇、周少琰:《重农学派与中国古代重农思想异同述评及启示》,《经济思想史评论》2007年第1期,第127页。

都在为他的臣民谋取福利,从无止境”。<sup>①</sup>在魁奈的眼里,中国的皇帝不谋一己私利,而以天下太平、人民安居乐业为己任。毫无疑问,这样的论调未免太理想化了。为此,德国学者利奇温评价说:“魁奈与启蒙时代的一般哲学见解有相同处,即认为国家的目的在于谋人民的‘和平及幸福’。在中国,这样的政府几千年来为人民谋‘和平及幸福’的事实,曾激发了伏尔泰和他所有以开明专制为政治理想的同时代人的钦慕,其中包括魁奈在内”。<sup>②</sup>

基于对中国制度文明的崇拜,魁奈认为中国完全可以作为一切国家的范例:“这个服从自然秩序的疆土辽阔的帝国,不就是一个稳定而持久不变的政府的范例吗”。<sup>③</sup>中华帝国安如磐石的统治,自然使魁奈心驰神往。他感叹道:“法国君主应当按照中华帝国的榜样,当作自己统治工作的主要目标,建立起一个本质上稳定的秩序”。<sup>④</sup>对此,卢梭批评说,“无论如何,别跟我谈合法专制主义,我不会欣赏它,甚至连听都不想听。合法与专制主义是两个互不相容的词,黏在一起没有任何意义”。<sup>⑤</sup>因为在卢梭看来,开明专制主义本身就是悖论:既然是专制主义,就不可能开明;既然开明,就不应该是专制主义。其实,卢梭误解了魁奈。魁奈的“合法专制论”本质上是一种“自然法专制论”,强调的是人对于自然法的无条件服从。<sup>⑥</sup>魁奈及其重农学派借助所谓“中国专制制度”所表达的,主要是一种热切的平等主义理念,因为他们一向认为法国社会的弊端在于缺乏“平等”。

魁奈被同时代人称作“欧洲的孔子”,<sup>⑦</sup>由此可见他对孔子景仰的程度。他说:“中国人把孔子看作是所有学者中最伟大的人物,是他们国家从其光辉的古代所流传下来的各种法律、道德和宗教的最伟大的革新者。《论语》这部书围绕着德行、有益的工作和统治的艺术,充满了格言和道德原理。孔子的学说在人民中间树立起公正、坦诚和一切文明的风尚。”<sup>⑧</sup>因此,任何诋毁孔圣人的言论,都遭到魁奈的批驳。针对当时法国大主教费奈隆<sup>⑨</sup>在《死者的对话》中所谓苏格拉底胜过孔子、希腊文化比中国文化高明的论调,魁奈在其《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一书中反驳:“中华强大的帝国,胜过欧洲最文明的国家。”孔子的《论语》“满载原理及德行之言,胜过于希腊七圣之语”。<sup>⑩</sup>不过,魁奈认为孔子的儒家学说造就了中国人文科学领先于欧洲,而欧洲的自然科学则强于中国。

结合上述,不难看出,重农学派的理论核心之一是重视对自然法则的倡导与遵循。在魁奈看来,自然法是最高亦最基本的法则,“自然法则确立对人类最有利的自然秩序,确切的规定适合于一切人的自然法,这是永恒存在的,不可改变的,显而易见是最好的法则。因此使得一切智慧之士和所有人类理性都无条件的服从于它们”。<sup>⑪</sup>而这种自然法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具体表现,就是魁奈所倡导的、中华帝国为榜样的开明专制。

### 三、农本商末与重农主义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农业大国,不同时期的有识之士和开明君主都十分重视农业生产,并形成了

① 魁奈著:《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中译本),第35—36页。

② [德]利奇温著,朱杰勤译:《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96页。

③ 《魁奈经济著作选集》(中译本),第420页。

④ 《魁奈经济著作选集》(中译本),第406页。

⑤ [法]艾田蕾著,许钧、钱林森译:《中国之欧洲》(第2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7页。

⑥ 高毅:《中华文明对欧洲启蒙运动的贡献之我见》,《贵州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第87页。

⑦ 法国重农学派的重要成员、《公民日志》主编博多称魁奈为“欧洲的孔夫子”,一百年后,日本的福泽谕吉也同样称呼伏尔泰。详情参见,折剑飞:《世界的中国观》,上海:学林出版社1991年版,第221页。

⑧ 魁奈著:《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中译本),第37—38页。

⑨ 费奈隆(Francois Fenelon,1651-1715),法国天主教大主教,古典主义的最后一个代表。曾担任路易十四的孙子的教师和冈布雷教区的大主教,被历史学家视为18世纪初贵族复兴的关键人物。

⑩ 利奇温著:《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中译本),第94页。希腊七圣通常被认为是:泰勒斯、梭伦、奇伦、毕阿斯、克莱俄布卢、庇塔库斯、佩里安德。

⑪ 魁奈著:《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中译本),第121页。

中国特色的重农思想。比如,战国荀子的“强本论”,认为农业是本业,应尽力“强本”,限制工商业的规模。商鞅作为重农抑商思想的第一人,极力主张“壹民务者,强;事本禁末者,富”,<sup>①</sup>认为农业是财富生产的源泉,富国只有发展农业生产一途,并严厉抑制工商业的发展。韩非更是明确提出重本抑末思想:“耕农之本”<sup>②</sup>、“商官技艺之末”。<sup>③</sup>经济思想史家唐庆增先生认为,“中国上古经济思想在西洋各国,确曾产生有相当之影响,尤以对于法国之重农学派为最显著”。<sup>④</sup>

如前所述,作为西方经济学家中最先关注中国的群体,重农学派经济哲学的核心概念是“自然秩序”。在他们看来,农业经济的成败在于是否尊重自然法则。而所谓的“自然秩序”在人类经济活动中的具体表现,就是对农业、对土地增加财富的重视。为此,魁奈提出了社会“纯产品”理论。该理论认为社会财富的构成不是货币,而是社会纯产品,而农业是唯一生产纯产品的部门。魁奈说,“君主和人民绝不能忘记土地是财富的唯一源泉,只有农业能够增加财富。因为财富的增加能保证人口的增加,有了人和财富,就能使农业繁荣,商业扩大,工业活跃,财富永久持续地增加。国家行政的成功,都依靠这个丰富的源泉”。<sup>⑤</sup>魁奈指出,“实际上,如果没有土地生产物,没有土地所有者和耕作者的收入和支付,哪里还有商业的利润和手工业者的工资呢?如果把商业和农业分离开来,认为它能够独立存在则不过是一个抽象”。<sup>⑥</sup>很明显,这些思想非常类似于商鞅的观点。

中国古代传统的春耕籍田大礼给启蒙时代的欧洲留下了深刻印象。中国皇帝“作为天子,他代表着自然秩序,即‘天命’;作为一个崇尚农业的君王,他每年庄严地亲手扶犁一次。他的百姓实际上是自己管理自己,就是说,他按照习俗和礼仪统治他们”。<sup>⑦</sup>

魁奈在《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一书第2章的第8、9两节专门探讨了中国的农业和附属于农业的商业。他非常赞赏中国的重农主义和历代君主重视农业的传统,魁奈曾鼓动法王路易十五及其皇太子仿效中国皇帝举行春耕籍田的仪式,以表示对中国重农传统的推崇!为此,当时有人评述魁奈在理论上并无新意时指出:“你所宣传的学说,即以农业为唯一富源,本来是苏格拉底、伏羲、尧舜和孔子早已创立的学说”。<sup>⑧</sup>马克思也认为,重农学派纯粹是从中国古代传统中“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sup>⑨</sup>法国著名作家、哲学家艾田莆说,“重农学派的经济体系即使不是来自中国现实,至少也是来自中国神话,魁奈和他的朋友们在耶稣会士的记述中发现了它”。<sup>⑩</sup>有中国学者认为,“重农学派尤其是魁奈赞扬和主张仿效中国重农思想的这些言论,表明他们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所得到的决不仅止于一般的影响,这种东方古代思想已经深深渗透于他们的重农理论之中”。<sup>⑪</sup>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虽然法国重农学派与中国重农思想渊源很深,但绝不能把二者简单划等号。陈勇勤先生评价说:“不应过分夸大先秦重农思想对法国重农学派的影响。毕竟重农学派是以重商主义的对比面出现的,他们要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就是说,中国先秦新改良的封建主义农业形式与18世纪中叶法国新兴的资本主义农业形式在本质上完全不同,企图以

① 《商君书·农战》。

② 《韩非子·诡使》。

③ 《韩非子·显学》。

④ 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366页。

⑤ 《魁奈经济著作选集》(中译本),第332—333页。

⑥ 《魁奈经济著作选集》(中译本),第65页。

⑦ [法]夏尔·季德、夏尔·利斯特著,徐卓英译:《经济学说史》(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9页。

⑧ 利奇温著:《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中译本),第95页。

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21页。

⑩ [法]艾田莆著,许钧、钱林森译:《中国之欧洲》(第2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30页。

⑪ 谈敏:《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中译本),第282页。当然也有学者对这种观点持否定态度,认为其“太牵强附会了”,详情可参见,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298页。李军:《西方经济思想的中国渊源:基于文献的初步回顾与总结》,《古今农业》2008年第1期,第11页。

封建主义生产关系根基上的经济思想来充实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根基上的经济思想,这在逻辑上是行不通的”。<sup>①</sup>董恺忱先生也指出,“被魁奈所赞誉的中国儒家经济思想,原是农业社会自然经济和宗法制度下的产物,是以它同魁奈为代表的法国重农学派的理论体系有本质的区别,中国儒家经济思想虽受魁奈的推崇,而恰好与之相类者也仅只是其理论体系的外观”。<sup>②</sup>的确,虽然都是“重农”,但二者在思想出发点、重农的内容、重农的根本目的上还是有着很大区别的。<sup>③</sup>在笔者看来,法国重农学派有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其诸多理论的哲学基础都是“自然秩序”理论。而中国古代重农思想则时空跨度大、系统性不强,更多的是一个思想体系。

## 结 语

历史学家阎宗临先生说,“让魁奈对中国感兴趣的不是中国本身,而是为他自己的经济理论找依据”,“魁奈对中国的研究不仅仅是由于对中国的倾心,而完全是把中国作为他重农主义原则的依据”。中国吸引魁奈的地方在于“中国政府的古老性和衡定性”。<sup>④</sup>法国重农学派以美好的言词称道中国的文化,并从中吸取了丰富的营养,为他们的反封建斗争增添了思想材料,为他们的理想王国提供可资模仿的实例。中国对法国重农学派的影响,是经过他们自己的咀嚼和消化才发生作用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所理解和表述的中国文化,已经或多或少地被他们加工改造,以满足反对封建、为资产阶级革命鸣锣开道的需要,因而已与其原来的面貌不同了。<sup>⑤</sup>

综上,从启蒙时代开始,西方文化开始将中国作为文化他者,想象构筑了一个具有确定乌托邦或意识形态意义的中国形象。在欧洲社会面前,中国形象为他们展示了“梦寐以求的幸福生活的前景”。<sup>⑥</sup>魁奈及其法国重农学派“中为法用”(套用“洋为中用”)的做法,毋庸讳言,对古代中国存有不言过其实、夸大美化之处。但毕竟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法国重农学派根据自己学说的需要,精心取舍来自中国的一切,从而服务于他们自己所倡导的原则,客观上极大地冲击了欧洲中世纪以来的污泥浊水,迎来了思想大解放的新时代。同时,这对当前中西方经济文化交流,以及我们如何应对向西方文明学习、突破文化传统中腐朽糟粕的束缚、塑造现代文明,都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责任编辑:魏明孔)

① 陈勇勤:《中西方经济思想的演化及比较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98页。李军:《西方经济思想的中国渊源:基于文献的初步回顾与总结》,《古今农业》2008年第1期,第8页。

② 李军:《西方经济思想的中国渊源:基于文献的初步回顾与总结》,《古今农业》2008年第1期,第11页。

③ 李禹阶、冀伯祥:《“重农”与“困农”:评魁奈对中国古代重农思想的认识》,《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第9页。

④ 阎宗临:《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年版,第120—131页。李军:《西方经济思想的中国渊源:基于文献的初步回顾与总结》,《古今农业》2008年第1期,第3页。

⑤ 许明龙:《中国古代文化对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影响》,《世界历史》1983年第1期,第36页。

⑥ Adolf Reichwein, *China and Europe: Intellectual and Artistic Contact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25, pp. 25 - 26.